

南行 南行

艾芜著



周良沛 主编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周良沛 主编



南行 南行

艾芜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行 南行 / 艾芜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 5

(云南文学丛书)

ISBN 978-7-222-08159-8

I. ①南… II. ①艾…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92736号

出 品 人 李 维 刘大伟

责任编辑 唐贵明

装帧设计 西 里

责任校对 毛 雪

责任印制 马文杰

《云南文学丛书》周良沛 主编

书 名 南行 南行

作 者 艾 芜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ynrms@sina.com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190千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8159-8

定 价 35.00元

出版说明

对于任何写作者，文学与人生的一体性，都是一样的，但它于文字的表现，不仅因为它所表现的人物、内容、背景的不同，作者自身的艺术个性、文学修养、表述能力的迥异，就更不可能一样，必然像生活本身，呈现天地万物的生存之态。这一点，表现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出版、时年二十六岁的艾芜（1904.6—1992.11）一举成名的《南行记》中特别强烈。他“在漂泊的旅途上出卖气力的时候，在昆明红十字会做杂役的时候，在缅甸克钦山茅草地扫马粪的时候——都曾经偷闲写过一些东西，但那目的，只是娱乐自己，所以写后就丢了，散失了，并没有留下的”。不论怎么说，虽然只是“娱乐自己”，又毕竟是一位能够用写作来“娱乐自己”者，而且能和洋人用英语对话，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国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情况下，应该是一位水平不俗的读书人。这一点，他在异域扫马粪的店家老板很

清楚，在扫马粪之余，他还要给老板的儿女上课；在昆明街头卖了一双草鞋所得的十个铜板，一次只敢买两个烧饼，塞进总处于饥饿状态的肚子；扫马粪还被马粪烧烂了一双脚。

他，艾芜，四川省新繁县（今合并新都县）连丰村人。原姓汤，名道耕。云南作家马子华在他流落昆明时与其有过相遇，在札记中称他为“汤爱吾”，想来这也是他用过的名字，笔名“艾芜”，正是“爱吾”的音。

艾芜父亲，是家乡的一名乡村教师，家道中落，一蹶不振，八元月薪，生活拮据，无力为儿女创造更好的生活、学习环境。艾芜小学还没有毕业，就考上了成都免费的第一师范学校。这一来，虽然减少了一些他的读书开支，但并未减少操持家务的母亲在生活拮据之中的操持之难，她积劳成疾，不幸去世。父亲，难上加难，借酒浇愁，家失主母，家也破碎。已成年的艾芜，成不了家，也失去了家。他更孤寂，读书也更刻苦、勤奋。同校的刘作宾受托于“新繁留省同学会”办的杂志《繁星》向他约稿，刊出了他的《个人与社会》。从它，已经可以看到艾芜在成都突破在乡下的闭塞后，眼界更宽了，个人的生存，系着个人的担当。他那嫌这省城还太闭塞的小学同学何秉彝，到了上海，在“五卅惨案”中牺牲，他闻讯赋诗——

满怀心腹事，尽埋仇恨中。

安得举双翼，激昂舞太空。

蜀山无奇赴，吾去乘长风。

由此诗，同学们看到平日沉默寡言的艾芜内心完全是另一样的世界。“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直接的影响，是激起他

反对每天读古汉语的死书，更具冲击的活力，是个性解放的思潮，燃旺冲破封建包办婚姻的心火。这不仅是对他个人，是整整一代的知识青年，当年都是以此求得精神的解放。他才十二岁，父母就帮他找媳妇。头一个只是因为八字不合未成，不久再来说媒的，因为八字合了，就办了酒席定亲。在那个时代，二十岁，已是男子普遍成婚的年纪，只是教书的父亲，看他还在读书，暂时还未逼他成婚，然而，这一婚约却始终是他身上的无形枷锁。何况，青春年华，他也渴望有自己的爱情，他也想同那嫌这省城还太闭塞的小学同学何秉彝一样，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当时，同是四川人，曾经领导了四川“保路运动”的革命家吴玉章（1878—1966），在孙中山（1856—1925）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时，与蔡元培（1868—1940）等组织了“留法勤工俭学会”，从一九一五年开始，那几年间，先后不少人奔这条路从四川走出，去“勤工俭学”。艾芜很羡慕，但也只能是个梦。任何条件下，办事总得有门路，他没有这个门路。他写信给《民立周报》留学法国的主编孙绰章，表示窒息于成都的落后与闭塞，已使他倍受生的痛苦，他决心上南洋半工半读。不想，此信被公开发表之后，影响非同一般，许多同学都表示要与他同行。加以护国之战后，川系军阀的派系为争夺地盘混战不断，派系内部也明争暗斗，百姓不得安宁。暑假将到，他去信给父亲，说自己想上北京考大学。愁困的父亲，毕竟是读书人，自己再难，也望子成龙，一次筹够了三十块大洋寄来。有了钱，原先不愿重蹈父辈人生悲剧的腰杆，这回挺得更直，更坚强了。他搭上木船顺水而流，两岸风景秀丽，一路好不潇洒。见凌云山，还下船上山到大佛寺。本来，无钱寸步难行，可是，这一大把银圆，沉甸甸的，拖累

得人也迈不开步。加以还不能不考虑安全问题，于是，留下几元零用，便托“富春恒”商号，先寄到云南昭通。船到犍为，四川内战的、不知何部的败军拥进古城，他赶紧出城，在江边的鸡毛小店歇下，并决心舍舟步行。虽然，一路上走得还算顺利，然而，原来认为成都闭塞而要走出来的他，却不知对于远远落后成都的小地方也一无所知。沿途虽然可以通用银圆，同样像现在视它为“硬通”，但地方势力割据，各地也发行纸币，沿途住、食掏出银圆，找回的纸币，到下一站就成废纸了。到昭通，想“富春恒”寄出的钱要能顺利到手，也遥遥无期……往下，我们就开始从他自述的《人生哲学的一课》，读他的《南行记》吧。

不过，此一名篇只写到艾芜卖草鞋。并未写到他想到替成都武侯祠题写过长联的学者，时任云南省图书馆馆长的赵藩，向他写信自荐求职，表示当工友干杂务都行。岂知竟以“夫以青衿学子，岂可沦为厮豢之役”以责，真是饱人不知饿人饥。他彳亍街头求职，徘徊书店门前，先后取出随他已行千里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一枚石章，希望老板能廉价收购。老板表明书店不收旧书，掂看印章则问：“上面刻的是你的名字么？”艾芜立即取出转学证以明正身，明说了此刻食宿无着的处境。这位王老板和赵藩截然不同，不是鄙夷，而是十分同情。告诉他到洗马河的红十字会去，自己会同那里的朱理事长通气的，去了说明是“明善书局”的王先生介绍，“他们会要你的”。

往下，真的要说：请看《南行记》吧！

如前所叙：它呈现内容的自我化，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特别强烈的。有时，作者在行文中，会不自觉地亮出自己“汤大哥”的身份，再版时，作者又将“汤”姓改为“张”

姓，真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感。然而，之所以由“汤”改为“张”，不仅是作者不愿读者视它为作者本身的自述，也是作品从它的纪实性中已经同时表现出它艺术的概括和所叙之事的典型性。此书出版后八十年间的影响，也足以说明这一点。围绕作者基本上是以第一人称“我”的传奇，围绕他生存状态的滚滚红尘所出现的盗马、走私、贩毒、殖民、流浪以及那些下层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系列江湖人物，为新文学描绘的人物长廊，增添了一群色彩鲜亮、有其独特个性的人物，丰富了这个长廊。所以鲁迅（1881—1936）先生以“选材要严，开掘要深”辅导、鼓励他的创作。他在“左联”被捕，请律师时，鲁迅还出钱，还向斯诺（Edgar Snow 1905—1972）介绍艾芜，说他是最有才华的左翼作家之一。艾芜之后出版的《南国之夜》《夜景》《山野》《故乡》《江上行》《春天》《烟雾》等等，尤其解放后描写工人生活的长篇《百炼成钢》，都是颇有影响的作品，具体作品可以高于《南行记》的评价，但不能替代《南行记》在艾芜个人的创作生涯和他在新文学史的光彩。

不糊涂的作家都明白：创作的本钱，在于生活的充实和积累，这样说，并未排除作者的才华和写作技巧的作用。因为艾芜明白《南行记》成功的秘诀所在。所以一九六一年六月“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听了周恩来总理鼓励深入生活、繁荣创作的讲话后，作家协会组织他和沙汀、林斤澜、刘真上云南体验生活时，三十四年前“南行”的情结，叫他又留了下来多待一些日子，这就有了本书卷下的《南行》续篇。人们常以当年他在昆明街头卖草鞋，此时在宾馆有地毯、卫生间之别的描述，表述他于此时“换了人间”之欣喜，此一“欣喜”，若还原于宾馆物质状况的描述，是否能

续写他的“南行”？不敢胡猜。

艾芜旧地重游，一地，一事，一物，都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都不忘他的故人旧交，过去悲剧中的人事，望它在“换了人间”中有个下落，然而，故人旧交之下落，并非都在“换了人间”的时候。于是，不论是由今忆昔，还是以昔看今，他从今，探求当年一些没有结局之事的结局，他以昔，延续于今又为现实添了不少波澜，这也使它更多了一些戏剧性和可读性。

虽然不是都有那些大团圆的喜剧以圆今日的“欣喜”，但悲剧所延续变幻的人世，总是摆脱了悲剧的血泪在思考悲剧。它每篇都腾出很大的空间写他当年所见，以找到它延续于今所深入到此的故事，但它或深沉，或沉重的对比，都有它纪实性所呈现事物自身的典型性，也就没有某种思考和表述之浮躁的轻飘。受到读者欢迎，也是必然。

几十年后重印重版，对它已是遗产的继承，若再学究式地多些碎语，不仅多余，更不知趣。

为此，我们采用了它一九三三年初版的版本，虽然作者后来有些应时性的改动，对此，我们每处都写有注文说明，却保留了它的原生态。



两篇，这由你仍
然未便征求意见，
所以，我提出三篇是：

《人与作品》，（日文）
《中国古代文学》，
《日本男表师65
位说》，八月将发表
（发表）内，发表一篇
《喜望云南的山川
文化文学》，是希望看
一本小册子《艾芜
1908年生。我看了

之后，才去较轻松地读艾芜作品，
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写了八本有关艾芜的作品，共三次出版
行，都用图线画。中国读者很少这样作。不多谈了。

此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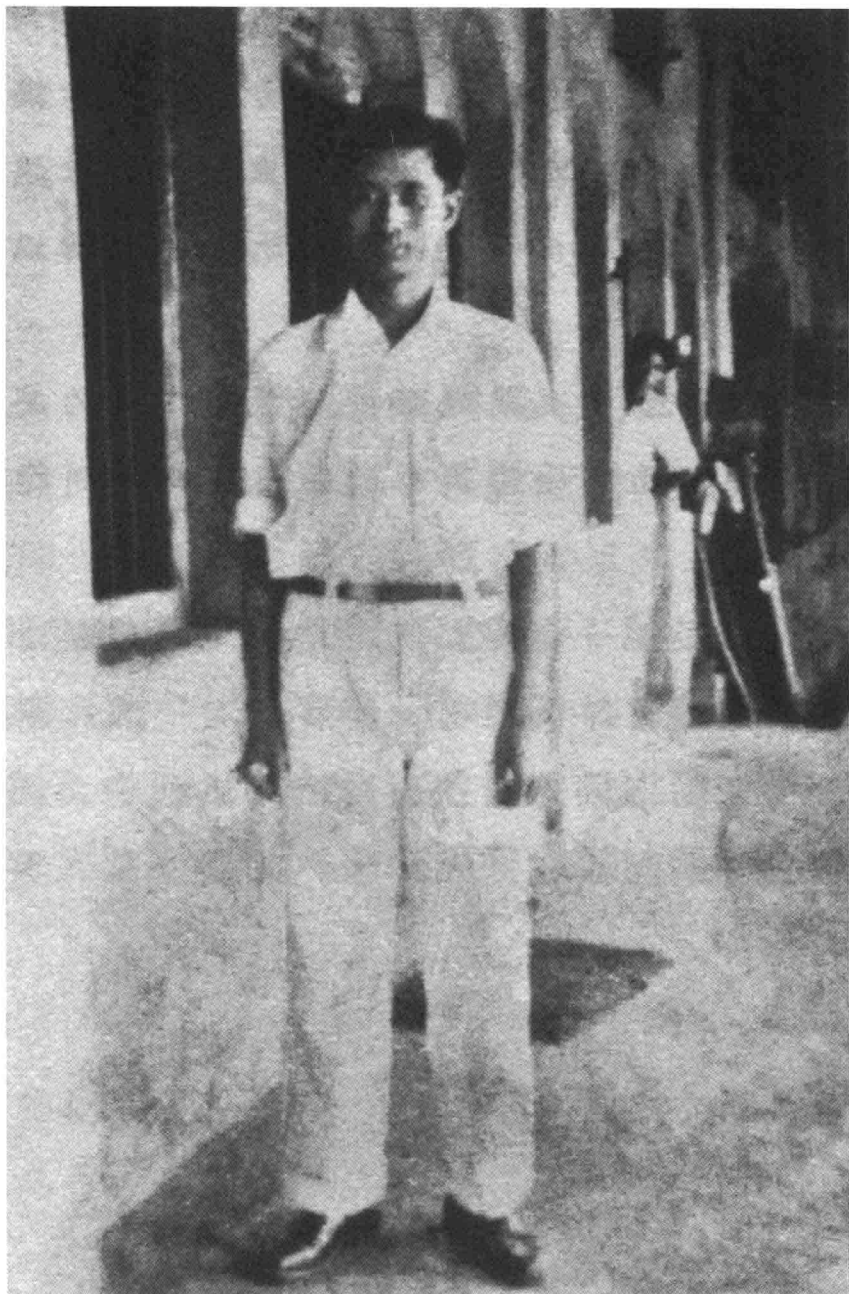
敬礼！

艾芜

1985年7月8日于成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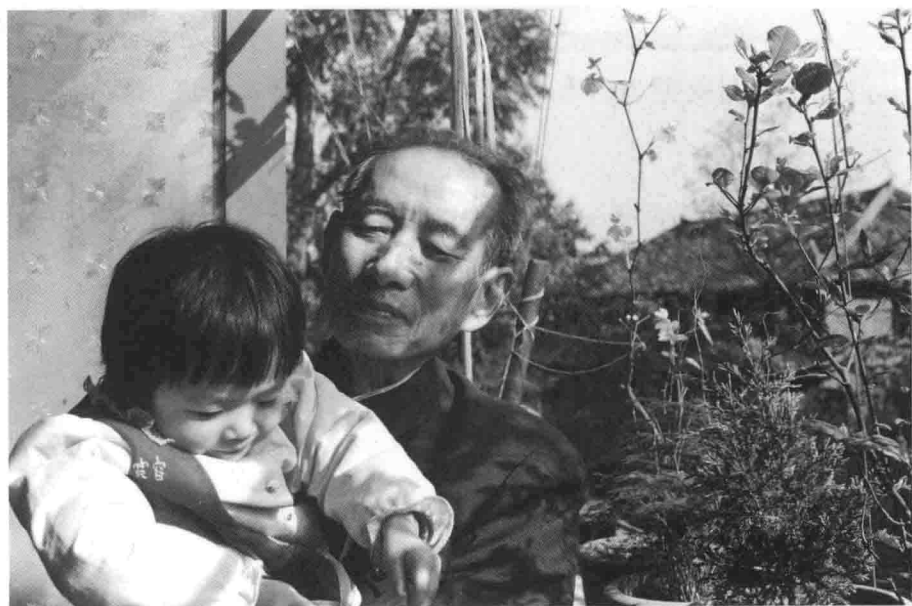
晚年仍然笔耕不止的艾芜



艾芜一九二八的照片



晚年仍在笔耕的艾芜



艾芜一九八五年与孙女宽容在成都红星路二段八十七号家中阳台



一九九二年八月艾芜与日本教授中田喜胜在四川省人民医院病房中



艾芜一九八一年第三次南行照片

上 卷

在漂泊的旅途上出卖气力的时候，在昆明红十字会做杂役的时候，在缅甸克钦山茅草地扫马粪的时候……都曾经偷闲写过一些东西。但那目的，只在娱乐自己，所以写后就丢了，散失了，并没有留下的。

至于正正经经提起笔写，作为某个时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现在也有一两篇存着的，那却是到仰光以后的事了。

初到仰光时，没熟人，又没有钱，而且病了，住在Maung Kine Street（当地华侨叫作五十英尺路）的腾越栈内，自然很引起主人的讨厌——想驱逐我，但并不明显地表示出来。这，大概是念在同国人的面上吧。一天，忽把我从床上拖起来。叫印度车夫送到仰光大医院去，说是那里可以住下养病，并且不要什么钱。同时又把我的全部财产——一包破书和旧书，好好地包着，叫我随身带去。这突然好起来的举动，使我非常感激，当登上人力车的时候，眼里竟然含着致谢的泪了。然而到了医院，才是由一位印度医生马马虎虎地诊了一下，就算了。并不容许我住下。于是，只好一路呻吟着，折了回来。但当这位好心肠的印度车夫，扶我走进店门时，老板便挺起肚子出来，塞在门口，马起脸说：

“这里住不下了！”

并挥着他那胖胖的拳头，仿佛硬要进去，便会动武似的。这样，我就算被驱逐了。

在店门前的街沿边上，我就把虚晃晃的身子，靠着我的小包袱坐着，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那时，心里没有悲哀，没有愤恨，也没有什么眷念了，只觉得这浮云似的生命，就让它浮云也似的消散吧。

这情形，大约是打动了旁人的悲悯吧。一个同店住的云南